



回回人与蒙古宫廷政变

——兼论元朝回回商人与回回法的盛衰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2)01-0148-10

● 杨志娟

[摘要] 蒙元时期,回回人屡次策划或参与蒙古宫廷的斗争和政变,给蒙元政治带来重大影响。这与一些蒙古统治者支持推行回回法有直接的关系。随着回回法的兴废,回回商人也因此或沉或浮。

[关键词] 回回商人;回回法;宫廷斗争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蒙元时代的回回主要是指当时中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中亚的突厥各族人。^①此时期,回回成为蒙元社会极具影响力的一个群体,尤其是回回商人风光一时。而回回商人的沉浮无不与回回法与汉法的斗争相联系,无不与回回法的代表密切联系在一起。

早在蒙古帝国时代,尽管中亚等地的回回商人成为蒙古人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蒙古大汗对回回、伊斯兰教基本采取宽容政策,但在蒙古和回回人间表现在风俗习惯及宗教上的冲突时有发生。《世界征服者史》、《元史》等史书记载,蒙古人与回回人曾在用水、宰杀羊只、饮食等方面发生过冲突。尤其是在宰杀羊只方面,蒙古人的扎撒中严禁用断喉法屠宰牲畜,但依照伊斯兰教法,穆斯林必须使用断喉法,两族在成吉思汗、窝阔台及忽必烈时期都因此发生过冲突,甚至发生过不儿哈纳丁案。^②类似的事件虽有发生,但并未涉及蒙古汗廷的斗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元明回商研究”(项目编号:10YJA850045)以及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蒙元回回商人群体研究”(项目编号:09CRKJ02)的研究成果。

① 参见杨志玖:《元代回族史稿》[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7.

② 不儿哈纳丁案,忽必烈赏赐食物给从忽里等地来的穆斯林商人,他们以食物禁忌为由拒绝了,忽必烈因此颁布“不得以割喉法宰羊”,而只能以开膛法宰羊的命令,违者处以死刑,于是穆斯林多避而不来或暗中仍以割喉法宰杀羊只。当时布哈拉人、毛拉不儿哈纳丁在汗八里传教,他被仆人告发以割喉法宰杀羊只,被发配到边远地区。此案在《多桑蒙古史》及《史集》中均有记载。



争。回回人真正卷入蒙古汗廷的斗争,是从窝阔台之后开始的,尤其是元朝前中期最为激烈。

一、蒙古帝国时期回回法与汉法的初步较量

公元1241年,窝阔台汗驾崩,蒙古帝国陷入权力纷争。窝阔台之妻脱列哥那哈敦摄政,为期达五年,其间汗国政治和秩序陷入混乱。有一些穆斯林被重用,并被卷入帝国权力纷争中,其中在征服中亚呼罗珊时被俘的穆斯林法提玛成为此时显赫一时的人物,因为脱列哥那哈敦对法提玛的宠信,许多大臣通过法提玛从哈敦处获得利益。他还积极参与汗国重要的人事任免,如怱怱脱列哥那哈敦撤换窝阔台时期的一些重要朝臣,而换上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人物。前朝窝阔台任命、掌管中国北方的马合木·牙刺瓦赤与时任宰相的畏兀儿人镇海被撤职,另一位名叫奥都·刺合蛮的中亚商人代替牙刺瓦赤,成为财政大臣。法提玛还试图抓捕牙刺瓦赤和镇海,在窝阔台之子阔端的保护下,镇海和牙刺瓦赤才免于死,形成蒙古帝国一次较为激烈的政治事变。^①事实上,在窝阔台时期,奥都·刺合蛮即得以重用,他“以货得政柄”,扑买汉地赋税大权。汗廷最初定汉地每年课税50万两,平定河南后,增为110万两,奥都·刺合蛮扑买后,增至220万两。《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奥都·刺合蛮扑买课税是一位译史向丞相镇海建议的,将中原课税从110万两增至220万两,即增加了一倍,同时又允许他加倍征收赋税,税额高达440万两。如此繁重的课税,使中原百姓的负担一下增加到了原来的四倍,所以朝中重臣耶律楚材一直反对。但因蒙古长期征战,急需经济力量的补充,奥都·刺合蛮的课税正符合蒙古上层的利益需求,所以1240年,他被任命为提领诸路课税所长官,主管征收汉地课税事宜。脱列哥那哈敦主政时更加重用奥都·刺合蛮,甚至把御宝印章和空纸交与奥都·刺合蛮,令其随意填写颁行。耶律楚材坚决抵制,说:“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宪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诏。”脱列哥那哈敦还下诏:“凡奥都·刺合蛮所建白,令史不为书者,断其手。”^②这又遭到耶律楚材的极力抵制,但不被理会,耶律楚材甚至因此失势,郁郁而终。

1246年贵由汗继位以后,处死法提玛和奥都·刺合蛮,重新启用马合木·牙刺瓦赤、马思忽锡父子以及镇海,结束了这场纷争。这段历史内容一般被认为是汗国重大的人事变动和汗国掌权者的权力争夺,是回回法派与汉法派的一次较量,^③也是回回法与汉法的第一次较量。回回法虽然终告失败,但其影响至广至深。奥都·刺合蛮是回回法派的代表,而汉化较深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则是汉法派的代表。奥都·刺合蛮实行的重税之法与耶律楚材等人的轻赋主张有很大冲突,而元初的战争状态使统治者急需聚敛财富支付各种开支,奥都·刺合蛮的政策更符合统治者的需求。蒙古统治者第一次从奥都·刺合蛮代表的回回理财法中获得巨大利益,为蒙古王公贵族服务的回回斡脱商人大行其道。虽然奥都·刺合蛮被处死,但代替他的是另一位回回商人出身的马合木·牙刺瓦赤,而且蒙古大汗仍然重用善于理财的回回大臣。蒙哥可汗在汗位巩固后,依然继承了之前重用回回商人的做法,“他把东方各地区赐给了撒希卜大臣马合木·牙刺瓦赤,突厥斯坦和河中诸城、畏兀儿诸城、费尔干纳和花剌子模,则赐给了异密马思忽锡伯。”^④可见虽然汗廷政权交替中有一些回回商人被卷入其中,被罢职甚至被杀,但重用原来即被信任的回回商人担当理财官职是蒙古帝国几位大汗共同的做法。尤其是在中亚各地,许多官职都由熟识当地情况的回回商人担任,他们大多也都不负汗廷信任,取得诸多政绩。

蒙哥可汗去世后,就汗位也发生了激烈的争夺,虽然没有材料表明回回人直接参与这场宫廷政变,但以赛典赤·赡思丁为代表的回回人显然在政变发生前即已有所选择。赛典赤·赡思丁在蒙哥可汗时即与马合木·牙刺瓦赤同任中州断事官,“牙刺瓦赤、不只儿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赛典赤、匿答马丁佐之”。^⑤忽必烈时期,忽必烈对赛典赤更是赏识有加,“帝每顾侍臣,称赛哇旗(即赛典赤)之能。不忽木从容问其故,帝曰:‘彼事宪宗,常阴资朕财

①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70.

② (明)宋濂:《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7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2.

④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5.

⑤ 《元史》卷三《宪宗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6.

用,卿父所知。卿时未生,诚不知也。’不忽木曰:‘是所谓人臣怀二心也。今有以内府财物私结亲王,陛下以为若何?帝急挥以手曰:‘卿至,朕失言。’”^①依此看来,赛典赤在蒙哥在位、忽必烈事汗地之时,常暗中以财支援忽必烈。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皇位的斗争中,赛典赤支持忽必烈,在忽必烈继位后得以重用。

总之,蒙古帝国时期,回回人虽多有被重用者,在理财等方面得到统治者的重用,但参与政治纷争者较少,以法提玛和奥都·剌合蛮为代表,他们对蒙古政治还未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忽必烈朝回回法与汉法的斗争中的回回商人

忽必烈时期,回回法与汉法之间的冲突最为严重。樛樛、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都是回回法的代表。虽然卢世荣和桑哥不是回回,但他们奉行的也是被汉族官僚集团所反对的重理财政策,且其党羽中有许多回回人,从而成为回回法的政治代表。

忽必烈朝初期,因统治重心逐渐南移至汉族地区,忽必烈逐渐重用一些汉族官吏,以学习汉法,治理汉地。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重用的平章政事王文统参与李璫叛乱,这使忽必烈对汉族官吏的信任大打折扣,他又转而开始启用一些回回官吏。正如当时一些西域官吏所言:“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敢为反逆。”^②忽必烈重用回回官吏,大概也出于这样的考虑,同时因为国库空虚,需要解决财政问题,而擅长理财的阿合马正合忽必烈之需,遂得到忽必烈的重用。“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③正因为阿合马这方面的才能,他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中统三年(1263),被任命为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阿合马上任后,为元政府开辟了财源,为元政府敛来第一笔财,得到忽必烈的赏识,遂升任中书平章政事,权势日隆。至元三年,朝廷设制国用使司,总理财政,阿合马兼领其职,掌管全国财政大权。至元四年,尚书省设立,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更是权倾一时。阿合马的急剧敛财政策使元政府的财政危机得以化解,他得到忽必烈的倚重,忽必烈对他大加赞赏:“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④

一时间,委附阿合马者比比皆是,仕者攀附取得要职,商者贿以资财以获取利益。阿合马甚至“以其子忽辛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右丞相安童见阿合马擅权日甚,欲救其弊,乃奏大都路总管以次多不称职,乞选人代之,寻又奏:“阿合马、张惠,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无所诉。”^⑤“中书左丞崔斌奏曰:‘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遂命阿里等澄汰之。今已显有征验,蔽不以闻,是为罔上。杭州地大,委寄非轻,阿合马溺于私爱,乃以不肖子抹速忽充达鲁花赤,佩虎符,此岂量才授任之道?’又言:‘阿合马先自陈乞免其子弟之任,乃今身为平章,而子若侄或为行省参政,或为礼部尚书、将作院达鲁花赤、领会同馆,一门悉处要津,自背前言,有亏公道。’有旨并罢黜之。然终不以为阿合马罪。”^⑥足见忽必烈对阿合马的信任。阿合马死后,清查其余党的行动殃及甚众:“五月己未朔,钩考万亿库及南京宣慰司。沙汰省部官,阿合马党人七百十四人,已革者百三十三人,余五百八十一人并黜之。”^⑦而依附这些权势经商获利者更是数不胜数,他们必然随着阿合马集团的倒台而饱受其害。

权倾朝野的阿合马既是回回法与汉法斗争的受益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阿合马的倒台与一直尊崇汉法的真金太子有直接的关系。太子真金深受汉族文化和汉族官僚的影响,对阿合马的政策极其反感,曾当着忽必烈和众大臣的面羞辱阿合马,而杀死阿合马的王著也是假冒太子之令诱杀阿合马的。阿合马被杀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激变,是元初政坛汉人官员与色目官员长期斗争的突出反映。

① 《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② 姚遂. 牧庵集(卷十五)“姚枢神道碑”,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本.

③ 《元史》卷二〇五《阿合马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④⑤⑥ 《元史》卷二〇五《阿合马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⑦ 《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阿合马死去三年之后,1285年,阿合马的余党阿散、答即古挑起牵涉太子真金的“禅位太子”事件。“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言事者请禅位于太子,太子闻之,惧。台臣寝其奏,不敢遽闻。”答即古和阿散闻之,以此相要挟,“请收内外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没钱粮,而实欲发其事,乃悉拘封御史台吏案。”^①世祖知之,“怒甚,太子愈益惧,未几,遂薨,寿四十有三。”^②太子真金的死虽因禅位事件案发,但深层根源仍然是汉族官僚集团与以回回为代表的色目集团间的矛盾。

阿合马死后,其党羽被清除,摆在忽必烈面前的巨大经济压力仍使忽必烈再次启用重理财之回回法的官吏。“阿合马死,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皆无以副世祖裕国足民之意。”^③安童推荐在阿合马事件中被治罪的其党羽卢世荣,正合忽必烈之意。卢世荣上奏:“天下能规运钱谷者,向日皆在阿合马之门,今籍录以为污滥,此岂可尽废。臣欲择其通才可用者,然惧有言臣用罪人。”世祖曰:“何必言此,可用者用之。”遂以前河间转运使张私纲、撒都丁、不鲁合散、孙桓并为河间、山东等路都转运盐使,其他擢用者甚众。^④从这一细节不难发现,不管当时汉族官僚以及后人如何评价以阿合马为代表的回回权臣,至少由阿合马从统治者的需要出发,注重理财,大批网罗能“规运钱谷者”,并非只接纳同宗同族者这点来看,亦应给予其客观的评价。

从忽必烈后期到成宗时期,比较重要的回回商人兼官僚是沙不丁。他是当时左右海外贸易的核心人物,在其下形成一个以回回商人作为主要成员的海商集体。

至元二十四年(1287),尚书省执政大臣、平章政事桑哥推荐此前管理泉府司和市舶司的沙不丁和乌玛尔为江淮行省官,沙不丁为行省左丞,乌玛尔为参政,仍领前职。帝“用桑哥言,置上海、福州两万户府,以维制沙不丁、乌玛尔筹海运船。”^⑤以沙不丁为首的回回海商为元朝政府带来巨额的收入。至元二十六年(1289),“沙不丁上市舶司岁输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两,诏贮之以待贫乏者”。^⑥这相当于元廷当年国库收入中黄金数目的六分之一多。沙不丁管理泉府司和市舶司两个机构,在为元廷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利用职权,多方牟利,除以私钱作为泉府司的本钱取息外,还对中外商人肆意掠夺。至元三十年,元政府在整顿市舶司的文中说:“近来忙兀台、沙不丁等自己根寻利息上头,船每来呵,教军每看守着,将他每船封了,好细财物选捡要了。为这般奈何上头,那壁的船只不出来有,咱每这里入去来的每些小来。为那上头,市舶司的勾当坏了有。”^⑦因长期掌管官本船,沙不丁利用官府提供的本金和各方面有利的政策,为自己谋利益,“蚕蠹国财,暗行分用”,^⑧甚至因此成为巨富。

不仅自己牟利,沙不丁等人还利用手中职权培植党羽,形成垄断海商的江南网络系统。沙不丁弟弟合八失及马合谋但的“皆有舟,且深知漕事”,沙不丁推荐二人“各以己力输运官粮”。马合谋但的即《元史》中提及的向元廷“进珍异及宝带、西域马”的泉州大商人马合马丹的。^⑨因为在海商集团中的影响力,马合谋但的被“遥授”为右丞、海外诸蕃宣慰使、都元帅、领海道运粮都漕运万户府事。

至元二十九年(1291),桑哥以“结党营私,贪污受贿”被处,其党羽遭到毁灭性打击,回回法也因此再次遭到打击。在桑哥党羽中,有一批回回官吏和斡脱商人,其中江淮行省中以沙不丁为首,所谓“要束木祸湖

① 《元史》卷一七〇《列传五十七·尚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② 参考《元史》卷一一五《列传第二·裕宗》,《元史》卷一七〇《列传五十七·尚文》。

③ 《元史》卷二〇五《卢世荣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④ 《元史》卷二〇五《卢世荣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⑤ 《元史》卷一四《世祖本纪十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⑥ 《元史》卷一五《世祖本纪十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⑦ 《元典章》卷二十二《户部八·市舶》[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影印元刊本,1998.

⑧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⑨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卷二三《武宗纪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广,沙不丁祸江淮,灭贵里祸福建。”^①一时间,江浙、湖广的桑哥党羽纷纷被“弃市”,^②沙不丁也处于死亡之边缘。至元二十九年二月,诏命江淮行省钩考沙不丁主管的詹事院^③的江南钱谷,十月,沙不丁、乌玛儿等人被遣诣大都。次年,曾被沙不丁“复资给之”的广南西路安抚副使赛甫丁被处死,“余党杖而徙之”,所有家产被抄没,^④但沙不丁得以幸免于死。忽必烈独留沙不丁,不能不说与他在江南海外贸易中的特殊地位有关。“时相独庇江淮省平章沙福丁(即沙不丁),复立泉府司俾之典领,以征舶商之输,谓家出财资舶商往海南贸易宝货,赢亿万数,若沙福丁黜,商舶必多逃匿,恐亏国用。世祖信其言。”^⑤之后沙不丁又逐渐得到重用。有臣上奏:“江淮省平章沙不丁,以仓库官盗欺钱粮,请依宋法黥而断其腕。”帝曰:“此回回法也。”不允。^⑥

贞元二年(1296),又诏令:“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儿、唵喃、樊答刺亦纳三蕃国交易,别出钞五万锭,令沙不丁等议规运之法。”^⑦大德四年十二月,“致用院官沙不丁言:所职采取希奇物货。”^⑧

西域人阿里亦为阿合马的党羽,阿合马被杀后,他依然任中书右丞之职。成宗时,他又奉命调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专领其省财赋”。大德七年(1304),御史台臣奏其“诡名习盐万五千引,增价转示于人”,但成宗痛斥御史台臣:“阿里朕所信任,台臣屡以为言,非所以劝告大臣也。后有言者,朕当不恕。”^⑨不久,成宗又升阿里为中书平章政事。

沙不丁和阿里的经历反映出元代回回人亦官亦商的现象十分普遍,以广开财源为特征的回回法、回回商人为蒙古统治者带来巨大财富,蒙元统治者对他们多有依赖。虽然迫于各种压力,蒙元统治者对他们时有重用,又时有打压,但即使在对回回法实行打击时期,仍然在许多领域重用回回商人。

三、阿难达政变及武、仁、英宗朝打击回回法的政策

世祖末年,中央财政又陷入危机,擅长理财的伯颜(赛典赤·赡思丁之孙,陕西省平章政事纳速刺丁之子)遂被擢为中书平章,位在诸平章之上。次年正月,世祖驾崩,真金之子铁穆耳嗣帝位,史称成宗。成宗仍任命伯颜为中书平章政事,管理国家财务。当时正值国家财政危机之时,伯颜实施了一系列整顿财政的措施,如对江南的户口进行普查清理,清查佛、道等寺籍佃户,将其编民,增加一些地区的岁课,劝阻皇帝对宗王大臣们无节制的赏赐,罢黜腐败官员等,收到了一些效果,使国家恶化的财政得以好转,史称这一时期为“赛梁秉政”,伯颜也因此登上仕宦的顶峰。

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成宗驾崩。成宗之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均在外地,伯颜与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马辛等人联手推皇后卜鲁罕称制,并欲共推安西王阿难答登上皇位。此时,右丞相哈刺哈孙暗中派使者北迎怀宁王海山,南接海山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二月,爱育黎拔力八达至大都,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控制了大都,将伯颜等人处死,阿难达被押往上都。五月,海山至上都,废了皇后,自己当了皇帝,是为武宗。伯颜等回回官员参与宫廷事变,使武宗对回回官员产生戒心,开始了打击回回官员的行动,其中回回官员、中书平章政事阿散被贬谪为辽宁行省平章,回回中书左丞乌伯都刺被贬谪为陕西行尚书省左丞。

这次政治波动,无疑给回回官员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危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大四年(1311)武宗

① 《元史》卷一七三《叶李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② 《元史》卷一六《世祖纪十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③ 主管皇太子事及钱财的机构。

④ 《元史》卷一七《世祖纪十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⑤ 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十二《董忠宣公神道碑》[Z]. 乾隆五十一年万氏刻本。

⑥ 《元史》卷一六《世祖纪十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⑦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⑧ 经世大典·站赤[A]. (明)解缙等纂. 永乐大典[C]. 卷19419. 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⑨ 《元史》卷二一《成宗本纪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死,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嗣帝位,即仁宗。他曾经将乌伯都剌·阿散调回京城担任中书平章政事。皇庆元年五月,阿散升任中书左丞相,两年后再升为右丞相,但不久又改任左丞相。仁宗也推行了一系列压制回回的政策,如罢回回哈的司属,规定“哈的大师止令掌教念经,回回应有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并从有司问之”。^①

至治元年(1320),仁宗之子硕德八剌嗣帝位,是为英宗。英宗登基之后,政治斗争更为激烈,不仅回回法的矛盾继续存在,蒙古贵族间的利益争夺亦愈演愈烈。英宗继位之初,承继仁宗的政策,继续实行汉法政策,打击回回势力。而以支持英宗继位居功并以此干预朝政的太皇太后答己死后,英宗重用蒙古人拜住,将在仁宗朝掌管政务的回回官员、左丞相阿散及中书平章政事乌伯都剌,分别贬谪为岭北行省平章政事和江淮行省平章政事。不久,以回回官吏阿散为首的前朝旧臣密谋政变,事败被杀。“有告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书平章政事黑驴及御史大夫脱忒哈、徽政使失列门等与故要束谋妻亦列失八谋废立,拜住请鞫,帝曰:‘彼若借太皇太后为词,奈何?’命悉诛之,籍其家。”^②这一事件在当朝史籍中记载较少,无从考证其真伪,因此也可能是英宗朝打击对立集团的延续。总之,这一阶段元廷对回回的压制政策明显增加,如:延祐四年四月,罢“回回国子监”,“课回回散居郡县者,户岁输包银二两”,^③至治元年五月,“毁上都回回寺,以其地营帝师殿”。这些政策不仅是对回回法及回回政治势力的打击,同时也对回回商人的活动造成极大的冲击。

四、“南坡之变”及倒刺沙事件

英宗的政策极大地打击了一批蒙古贵族以及回回官商的势力,终于引发了又一次宫廷政变。太皇太后答己死后,英宗打击其残余势力,尤其是曾极度得势的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死后,英宗抄其家、夺其势,铁木迭儿之子、宣政院使八里吉思也因“冒献田地”的罪名被处死。一时间,铁木迭儿党徒人人自危,其义子、御史大夫铁失深恐祸及自己,遂生谋逆之心,企图另立新主,于是决定发动政变,推立镇守漠北的忽必烈之孙、晋王也孙铁木儿为帝。当时,“王府内史倒刺沙得幸于帝,常伺朝廷事机,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且入宿卫。久之,哈散归,言御史大夫铁失与拜住意相忤,欲倾害之。”^④至治三年(1323)三月,铁失暗中与倒刺沙结交,密谋政变之事。“八月二日,晋王猎于秃剌之地,铁失密遣斡罗思来告曰:‘我与哈散、也先铁木儿、失秃儿谋已定,事成,推立王为皇帝。’又命斡罗思以其事告倒刺沙,且言:‘汝与马速忽知之,勿令旭迈杰得闻也。’”^⑤五日,正值英宗与丞相拜住自上都南返,待行至30里外的南坡处暂住时,铁失借助自己统领的阿速卫兵,与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大司农先秃儿、前平章政事赤金铁木儿、枢密院副使阿散等人发动政变,先将丞相拜住杀死,最后又将英宗弑于卧所。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南坡之变”。这次政治变动,为回回官员再次把持朝政提供了契机。十月四日,晋王也孙铁木儿于龙居河(即克鲁伦河)旁即帝位,史称之为泰定帝。当日,泰定帝任命也先铁木儿为中书右丞相,倒刺沙为中书平章政事,铁失为知枢密院事,另一个参与南坡之变的回回官员马速忽同知枢密院事,以枢密副使阿散为御史中丞。不久,倒刺沙又被擢为中书左丞相。不久,朝中大权由倒刺沙一人掌管,回回官员重新受到重用。前时被调离京师、政变支持者乌伯都剌又被调回中书省任平章政事,另一个回回官员、纳速刺丁之子伯颜察儿也被调到中书省任职,倒刺沙兄马某沙升任枢密院事。朝廷还在泰定元年六月,“作礼拜寺于上都及大同路,给钞四万锭”。^⑥该年九月,有旨将在英宗朝被杀的回回官员阿散的家产返还其子脱列,此外,朝廷还免除了“答失蛮”^⑦的差役,优待回回商人。这些政策的出台,不能说与政局的变化无关。

① 《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一·职制条》(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②③ 《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④⑤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⑥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⑦ 元朝对回回宗教从业者的称呼。

因倒刺沙位居丞相,一时间西域人纷纷党服于他,回回商人也在其政治势力的保护下大获其利。倒刺沙不仅为回回人谋取政治权利,而且为其族人谋取经济利益,从倒刺沙处得到好处的商人何至一二。“倒刺沙贷其姻室长庐监运司判官亦刺马丹钞四万锭,买监营利与京师,诏追理之。”^①倒刺沙以权为其族人谋私利的例子还有很多。“回回人哈哈的,自至治间(1321~1323),贷官钞违制别往番邦,得宝货无算,法当没官,而倒刺沙私其种人,不许。”^②在泰定帝时期,围绕倒刺沙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回回官商集团,许多人都是亦官亦商或官商结合来牟利。

五、天历之变

致和元年(1328)^③三月,泰定帝率皇后、皇太子等人巡幸上都,命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金枢密院事燕铁木儿留守京师。以燕铁木儿为首的蒙古贵族对泰定帝的施政极为不满,认为泰定帝并非武宗之后,伺机改立武宗子为帝(武宗有二子,长子和世㻋远居漠北,次子图帖睦尔居江陵)。八月,泰定帝死于上都,一时间,政局不稳。倒刺沙为了稳住局面,首先遣使至大都,命平章政事乌伯都剌收掌百司印。此时,燕铁木儿已在大都同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定下政变的具体计划。西安王以“弟不先兄”为由,认为应立武宗长子和世㻋,而燕铁木儿则认为和世㻋远在漠北,应先迎立次子图帖睦尔以安民心,西安王表示同意。八月四日,由西安王下令,召集百官至兴圣宫。乌伯都剌已接到上都令百官齐缴印章的敕令,便想借此机会办理此事。但百官刚到齐,燕铁木儿就率领阿剌铁木尔、孛伦赤等17人持兵刃而入,宣布:“祖宗正统属在武皇帝之子,有不顺者斩!”当即下令拿下了乌伯都剌和伯颜察尔两名回回官员,又将朝中敌对者如中书左丞朵朵、参知政事王士熙等一大批官员捕入狱中。燕铁木儿等人拥兵控制了大都,立武宗次子图帖睦尔为帝,是为文宗,改元天历。中书左丞相倒刺沙与梁王王禅、辽王脱脱等则在上都立泰定帝之子为帝,是为天顺帝。双方各为其主,调集军队相互征讨,“两都会战”由此爆发。上都在对抗中失败,天顺帝在位不足一月即被赶下台。文宗图帖睦尔在位一年,即迫于其兄和世㻋重兵压力让位于和世㻋。天历二年(1329),武宗长子和世㻋在和林北即帝位,是为明宗。明宗继位后,南还大都,行至上都附近的旺忽察都(在今河北张北县北)时,名义上已逊位的图帖睦尔与燕铁木儿前往迎接,伺机毒死明宗,于是图帖睦尔复于八月即位于上都。这次宫廷政变,史称“天历之变”。

天历之变时期是元朝政局最为动荡的时期。政变对回回群体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倒刺沙被分尸而死,其宅被赐予不花帖木儿,其子波皮之宅被赐予斡都蛮,其兄马某沙及乌伯都剌、王禅、纽泽、撒的迷失、也先铁木儿等被弃市而死,^④哈哈的被抄家,亦刺马丹贷官钞赢利所得被追回。^⑤朝廷下令清查倒刺沙党羽,波及普通的西域回商,江南常熟等地回商受害者尤多。之前回回商人所享有的免税特权和从事斡脱经营、牟取暴利的特权随之丧失。天历二年(1329),令“回回人户与民均当差役”。^⑥

天历之变后,回回法基本上在元廷失去支持,直至1368年元亡。虽然回回商人在各地仍然十分活跃,尤其是江南海商业仍基本被回回商人所垄断,但再无回回权臣把持朝政或参与宫廷政变的事件发生。

从蒙古帝国窝阔台末期到天历之变平息,回回权臣屡次参与或发动蒙古宫廷政治纷争甚至政变,以回回官商为代表的回回法兴衰长达百年时间,影响了蒙元一个世纪的政治走势。归纳起来,蒙元时期回回权臣参与的重大政治斗争有如下一些:

① 《元史》卷三二《文宗本纪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② 《元史》卷三二《文宗本纪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③ 在这一年,元泰定帝改年号为致和。当年八月十五日泰定帝病逝后,先后有两位皇帝登基,所以这一年又是天历元年和天顺帝元年。

④⑤ 《元史》卷三二《文宗本纪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⑥ 《元史》卷三三《文宗本纪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时间	事件	关涉回回人物	结局
1241 年 ~1246 年	第一次回汉法之争	奥都·刺合蛮、法提玛、马合木·牙刺瓦赤	回回法失败，奥都·刺合蛮、法提玛被杀
1263 年 ~1282 年	阿合马事件（世祖朝）	阿合马及其党羽	阿合马在忽必烈时期被重用为丞相，1282 年被杀
1291 年前后	桑哥事件	沙不丁、乌玛尔	桑哥党羽多被处决，沙不丁幸存并又被重用
1307 年	阿难答政变（武宗、仁宗朝）	伯颜支持阿难答继位失败	伯颜被杀，阿散、乌伯都剌分别被贬谪。武宗朝、仁宗朝持续打击回回势力
1320 年	阿散“谋废立”事变（英宗初继位时）	前朝中书左丞、当朝辽宁行省平章阿散	阿散等参与事件者被杀，家产籍没
1323 年	南坡之变（英宗末年）	倒刺沙、乌伯都剌、伯颜察儿（伯颜之弟）、马某沙（倒刺沙之弟）	倒刺沙任中书左丞相，乌伯都剌任中书省平章政事，伯颜察儿也被调到中书省任职，马某沙升任枢密院事
1328 年 ~1329 年	天历之变（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皇位交替）	倒刺沙、乌伯都剌、伯颜察儿、马某沙	倒刺沙、乌伯都剌、伯颜察儿等被杀，倒刺沙集团被清查

回回权臣参与的这些政治斗争 对蒙元社会及蒙元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尤其是在伯颜参与策划的阿难答政变、倒刺沙集团参与的南坡之变和天历之变中 回回人直接策划和参与了皇位之争 导致元朝皇位的非正常交替 这时期也成为元朝政治动荡的最重要时期。参与这些事件的回回权臣是回回群体的代表 与回回群体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沉浮不仅影响着蒙元政治、经济的发展和走向 也影响着蒙元统治者针对回回群体的政策 直接或间接地对蒙元时期许多回回 甚至是整个回回群体都造成极大的影响。

六、结语

综观蒙元政治斗争和政变的历史 其中贯穿了回回法与汉法的斗争 大多商人出身的回回官吏能够如此深入地涉足元朝政治漩涡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 蒙古游牧民族面对广大的征服地 缺乏系统的统治制度 必须依靠其他民族 尤其是定居民族的辅助 汉人和色目人是可依赖的两大部分。虽然汉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但与蒙古游牧文化的价值观念及文化背景距离很大。色目人中亚回回人是较早被征服和归顺的 文化程度也较高 而且其文化与蒙古游牧文化更为相近 蒙古人的重商传统和对商业的需要与伊斯兰文化中的重商传统以及穆斯林擅长经商契合。商业是游牧民族共同的追求，这从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不满足于中原王朝所开榷场 不断南下可见一斑。另一方面 面对地域辽阔的中原农耕地区 蒙元统治者又不得不逐步调整统治政策 更多地吸收汉法 以达到汉地的长治久安。在诸次政变和政治纷争中 回回法和汉法的冲突最为激烈 集中体现在“义利”之争上。伊斯兰文化和汉族文化对义利的不同理解是回回法与汉法冲突的根源 关于这一点 已有许多学者有详细论述。^①而元代各种史料对回回法的代表奥都·刺合蛮、阿合马、桑哥等人极力痛斥 事实上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汉文化观念对伊斯兰文化的排斥。

终蒙元一朝 蒙古统治者对待汉法与回回法的态度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但一直试图达到双方的平衡。事实上 蒙古人的用人政策显得颇为实际 在蒙古帝国时期即形成在不同领域信任和任用不同的人

① 如马娟在《元代回回法与汉法的冲突与调适》（《回族研究》2002 年第 4 期）一文中说道：“伊斯兰教主张两世并重 即今世与后世同等重要 要求穆斯林今世积极工作 以保证有美好的后世。换言之 伊斯兰教既顾及信仰者的精神世界 又密切关注其物质世界。《古兰经》允许穆斯林通过合法手段获得和拥有财富 所以回回人的好商逐利在伊斯兰教看来是合法的行为。而汉法则相反 它更多地探索精神领域 如生死观念、伦理纲常 鲜有物质方面的言说。中国传统社会历来重农抑商 士大夫皆以经商为耻。二者相比 伊斯兰教重商、崇商的特点就更加突出。”

才。在军事征战方面,他们依赖蒙古统帅,在经商和理财、赋税制度的制订方面,他们更信任回回人。在对汉地的治理方面,则大量用汉人。而在宗教方面,蒙古人重视道教、佛教,但对诸如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只要不威胁其统治,也能宽容待之,任其存在。尤其是在蒙古人从蒙古草原走向汉地的转折期中最成功的统治者代表——忽必烈即是广泛吸纳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才。《剑桥辽西夏金元史》写道:“他在自己的周围笼络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幕僚,其中大部分是汉人”,但“在他以后的事业中,他常和聂思脱里基督教徒、吐蕃佛教徒以及中亚穆斯林教徒磋商,而不把自己囿限于汉族幕僚之中。”“他的汉族臣僚不可能受到完全信任,而且他们也不能帮助忽必烈实现他的所有目标。例如,在军事方面,忽必烈依赖蒙古统帅的建议及辅佐。他把当前的和以后的军事行动都委托给蒙古人。他用畏兀儿人和突厥人做翻译、地方长官和文书主管。所以,1459年蒙哥去世时,忽必烈已经招募了代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不同职业的幕僚和官员。”^①

正因为蒙古统治者的政策时有变化,并非一以贯之,这必然导致不同政治集团间的斗争,大臣们甚至被裹挟进宫廷政变之中。

2. 蒙古统治集团没有形成严格的帝位继承制度,致使帝位之争不断发生,政局不稳,帝位更替频繁,这给帝位周围的势力集团形成可趁之机。在蒙哥汗——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文宗皇位交替中几乎都发生过宫廷政变或皇位争夺斗争。忽必烈打败了兄弟阿里不哥,得以巩固帝位。忽必烈在位时,太子真金去世,未立储君。忽必烈死后,真金长子甘麻刺和幼子铁穆耳就有过皇位之争,铁穆耳成功继位,是为成宗。成宗驾崩后,忽必烈三子忙哥剌之子——安西王阿难答和真金之孙海山兄弟之间又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帝位之争,1307年阿难答政变失败,武宗继位。武宗念及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平息政变中有功,立之为储君,但兄弟之间因为皇位已存间隙。有臣劝武宗改立皇子和世㻋为皇太子,并称:“今日兄已授弟,后日叔当授侄,能保之乎?”^②至大四年(1311)正月武宗死,爱育黎拔力八达以储君身份继位,是为仁宗。这次皇位交替虽未发生事变,但权力斗争仍然激烈。1321年,仁宗驾崩,皇位果然未传于武宗之后,而是由自己的儿子继承,是为英宗,这也埋下了英宗与武宗之后的矛盾隐患。1323年,发生“南坡之变”,英宗被杀,被封为晋王、戍守元帝国北疆的甘麻刺之子也孙铁木儿通过政变继位,为泰定帝。1328年(天历元年),泰定帝死,“天历之变”爆发,引发元朝历史上最激烈的皇位争夺,三位皇帝相继登场,武宗之子图帖睦尔(文宗)两次继位,并杀死自己的兄长,拥立泰定帝之子天顺帝的倒剌沙被杀,其党羽遭到毁灭性打击。元代皇位变更频繁,在中国历史上亦属罕见,尤其是从成宗之后,皇位变更最为频繁。1307年成宗驾崩,武宗登基,到1333年元代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登基为止,26年间经历九位皇帝,平均每位皇帝在位不到三年,其中三位皇帝在位都不过一年,最短的仅在位一个月。可见元朝皇位之争十分激烈,几乎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政治波动。蒙元皇位之争不仅频繁而且复杂,涉及兄弟之争(如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甘麻刺与铁穆耳、武宗之子和世㻋与图帖睦尔、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叔侄之争(阿难答与海山兄弟)及家族之争(窝阔台系与托雷系、托雷子嗣之间,尤其是忽必烈之后皇位在他的子嗣之间不停地被争夺,忽必烈四子真金、甘麻刺、忙哥剌与铁穆耳及此四子之子嗣都参与了皇位之争,武宗和仁宗为真金之孙,阿难答是忙哥剌之子,泰定帝为甘麻刺之子)等多种复杂形式,其背后有汉族集团、回回集团、蒙古集团等多种势力集团,更增加了皇位争夺的复杂性。尤其是元朝中后期,蒙古游牧文化崇实力、尚武力的价值观使皇位争夺战屡屡上演,汗廷在帝位继承上鲜有汉族儒家文化重视的正统、忠君等观念,这就为皇位周围的权臣提供了机会。在这些政变中,回回官员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尤其“南坡之变”和“天历之变”最为激烈,在这两次宫廷政变中,回回权臣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充当了政治推手。一旦集团支持下的继承人成功继位,则必然带来极大的利益回报,直接影响到回回权臣的命运,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们身后的庞大利益群体——回回商人,因为元代回商的一大特点是官商结合或亦官亦商。

3. 对财富的无度追求和需要是回回权臣屡现蒙元政坛的重要原因。蒙元长期征战,赏赐无度,国库一直空虚,财政经常出现赤字,需要在很短的周期内解决财政问题,这是回回商人常被重用的主要原因。元朝从立国到亡国,财政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央政权的重要问题。蒙元无休止的军事征伐,蒙古贵族对财富的无休止的追求

① 费正清、崔瑞德:《剑桥辽西夏金元史》(第5章)“忽必烈汗的统治·最初岁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② 《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



以及蒙元皇帝对诸王勋戚的赏赐等原因,给蒙元政府造成沉重的财政压力,尤其是“作为蒙古贵族利益的主要体现,对诸王勋戚的赏赐是元朝最沉重的财政支出”。^①时人也将赏赐太侈列为害政最甚者之首。至大四年(1311)主管中书政务的李孟上奏:“今每岁支钞六百余万锭,又土木营缮百余处,计用数百万锭,内降旨赏赐复用三百余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今帑藏见贮止十一万锭,若此安能周给。”^②一年中军需将近占到总支出的三分之一,赏赐占到六分之一,如此开支,难怪汉族大臣尽管对回回理财大臣的政策十分不满,却又对解决问题一筹莫展。善于理财的回回权臣大多是在元廷急需解决财政危机时任用的,奥都·剌合蛮、阿合马、伯颜、沙不丁、乌伯都剌以及地方大批经营海外贸易的官商、民间商人,他们在大的方面为蒙古统治者暂时解决财政危机,在小的方面为元廷带来商业收入和奇珍异宝。所以即使为权者深知回回商人在为自己、为朝廷带来利益的同时也隐埋着诸多隐患,也仍然对他们听之任之。忽必烈时期,桑哥事发,其党羽皆被处决,唯沙不丁独活,且又被逐渐重用,即是例证。

在汉族官吏看来,重利不可取,唯利是图不可取,他们甚至公然表达对回回权臣的鄙视。“是时(指至元元年,1264年)贾胡(指阿合马)以钱谷事夤缘为奸,欲乘隙取相位,求荐于公(指王鄂)。公愤然曰:‘即欲举此人为相,吾不能插驴尾矣。’”^③在汉族官僚眼里,奥都·剌合蛮、阿合马、倒刺沙等权臣无不是奸商出身,他们的政策对国家法度产生破坏,但是作为敌对势力,汉族官僚在反对回回法的同时,面对元廷巨大的财政赤字,束手无策,无法解决这一严重问题。对抗奥都·剌合蛮的耶律楚材,对抗阿合马的真金集团无一例外,甚至武宗和英宗时期得到重用的汉法代表李孟也在一系列改革无疾而终时被迫选择辞官卸职,统治者最终仍会启用回回理财大臣解决财政问题和聚敛财富。允许回回商人扑买课税、增加收入,就是元代一项重要政策,奥都·剌合蛮即是窝阔台时期因扑买课税,为帝国增加收入而得以重用的。成宗大德初,有西域商人拟出银100万两,扑买天下盐课。大德三年(1299)获扑买课税的“山东转运使阿里沙(回回人)等增课钞四万一千八百锭,赐锦衣一袭”。^④

4. 从蒙古国到元朝,回回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发挥又与其在上层的政治代表的作用纠结在一起”。^⑤阿合马的党羽遍天下,并且许多回回官僚因贿赂阿合马才得以入仕,成为左右官商的重要力量。桑哥虽不是回回人,但同为色目人,以善理财而被重用,许多回回人因此依附桑哥而经营获利。在世祖朝禁止回回抹杀羊只的事件中,禁令实行七年后,由于回回人联合贿赂桑哥,桑哥以禁令颁布以来,回商裹足不前,甚至避而离去,致使商税顿减、珠宝短缺为由,上书忽必烈,禁令才被解除。在桑哥事发后,清查其党羽,祸及许多回回人,包括许多亦官亦商的回回富商大贾。倒刺沙为泰定帝朝位高权重的回回代表,他网罗的回回商人以及回回官僚更是遍布全国,尤其是江南掌管海运及海外贸易者无不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太宗时,以才授真定、济南等路监榷课税使,因家真定”的赡思因不愿依附倒刺沙,成为当时辞官的典范。“时倒刺沙柄国,西域人多附焉,赡思独不往见。倒刺沙屡使人招致之,即以养亲辞归。”从这段史料可推断出,当时西域回回人绝大多数依附于倒刺沙。

这些回回政治代表的盛衰无不影响着庞大的回回政治和商人集团的盛衰。他们紧紧地纠结在一起,跟随元代社会沉浮,也反过来影响着元代社会的沉浮。(本文英文摘要见P.207)

[收稿日期]2011-10-29

[作者简介]杨志娟,女,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烟台 264005

① 陈得芝. 耶律楚材、刘秉忠、李孟合论 —— 蒙元时代制度转变关头的三位政治家[A]. 刘迎胜主编. 元史论丛[C](第九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

② 《元史》卷二四《仁宗本纪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③ (元)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M]. 卷十二“内翰王文康公”.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240.

④ 《元史》卷二〇《成宗本纪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⑤ 高荣盛. 元大德二年的珍宝欺诈案[A]. 刘迎胜主编. 元史论丛[C](第九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



GDP 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表明,当前,客运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较小。同时,客运加快了劳动力输出进程,这不利于以 GDP 为指标核算的社会产出的增加。

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进程,民族地区应加快完善交通设施,在短期内积极鼓励货运需求的增加。在区域经济发展至一定水平时,在极化效应的作用下,可以将交通运输业发展成为地区支柱性产业之一。

[收稿日期]2011-10-19

[作者简介]关辉国(1964~)男,兰州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兰州 730020

王娟娟(1981~)女,兰州商学院经济学院硕士生导师,博士。兰州 730020

Analysi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ransport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thnic Areas: A Case Study of Linxia

Guan Huiguo Wang Juanjuan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ransport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article took Linxia as a case for study. By using correlation analysis, regression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freight demand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in ethnic areas whil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assenger transport need and economic growth is not so remarkable.

Key words: transportation; ethnic area; economic growth; correlation

Hui People and Mongolian Palace Coup: the Role of Hui Merchants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Hui Statute in Yuan Dynasty

Yang Zhijuan

Abstract: In Yuan period, Hui people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Yuan's politics by plotting or participating in palace coups several times,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implement of Hui statute supported by some Mongolian ruler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activities of Hui merchants changed along with Mongolian policies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Hui statute.

Key words: Hui merchant; Hui statute; palace coup(See P.148)

A Review of the Study of Fuxi since the 20th Century

Yu Liangcai Lu Lanhua

Abstract: The Modern study of Fuxi started from a series of papers titled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Fuxi written by Mr. Wen Yiduo. After that, scholars carried out various researches on Fuxi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based on newly found materials by using new methods. This article worked out a summary about the study of Fuxi since the 20th century, and provided some reflections upon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it.

Key words: the study of Fuxi; ancient history; ancient civilization; image archeology; myth; Fuxi Belief(See P.189)

Chinese Korean of Yanbian and the Korean War

Meng Qingyi Liu Huiqing

Abstract: Chinese Korean, as a member of fifty-six nationalities of China, has unique historical features compared with other nationalities in the course of its formation, because it is a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 Their participation in Korean War showed special significance on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China. Based on objective stanc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narrat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ese Korean's settlement in China and clarifying the reasons, activities and roles of Chinese Korean in Korean War.

Key words: Chinese Korean; Korean War; Yanbian(See P.196)